

中青年名家诗词集·梁鉴江卷

北
亭
集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中青年名家诗词集·梁鉴江卷

北
亭
集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亭集 / 梁鉴江 著. - 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
2006.5

(中青年名家诗词集)

ISBN 7-5013-3146-4

I . 北... II . 梁... III . 诗词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6894 号

书名 北亭集

著者 梁鉴江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010-66139745, 66175620, 66126153

66174391(传真), 66126156(门市部)

E-mail cbs@nlc.gov.cn(投稿) btsfxb@nlc.gov.cn(邮购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× 1230(毫米) 1/32

印张 4

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2000

书号 ISBN7-5013-3146-4/I·199

定价 150.00 元(全十册)



梁鉴江 1940年生，广东广州人。广东人民出版社编审、中国韵文学会理事、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、《柳宗元研究》顾问、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顾问、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、广东楹联学会副会长、广州诗社社长、《诗词》总编辑。著有《柳宗元传》、《走进高雅》、《青琅玕集》等11种，是《中国历代小品丛书》（6种）的第一副主编，发表诗歌数百首。

吟风啸月与时代担当

——《中青年名家诗词集》总序

◎黄君

赶在一个百花盛开，芳香四溢的季节，《类编中华诗词大系》编辑部又为您奉上一簇在当代中青年作者群内采撷的诗词之花，希望以此与已经出版的《当代名家诗词集》延续为一个系列，一个当代诗词创作的链条。

《中青年名家诗词集》的作者范围较老一辈“名家集”为宽松一些，我们计划按 30~50 人的规模，比较全面地推出大致 60 岁以下的诗坛主要作者的成果，考虑中青年作者的实际创作经历和水准，每个人选用作品的数量控制在 100~120 首之间。我们说老一辈诗词作家以其特殊的时代背景，实属传承中华诗学的一脉，那么，作为新生代，理应接续这一脉诗学，并努力使之发展、壮大。以此观照今日诗坛，解读并衡量中青年诗家的作品，我们会有很多深切的感受。

诗学成功的要义，不仅在技法的纯熟和艺术形式的完美，更重要是时代精神的支撑，一种既有历史传承，却又区别于历史的时代声音的形成。诗是心灵的苗圃，是灵魂的花朵，它的芬芳、美丽，是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。当代中青年

作者，不乏有思想头脑，具真知灼见的文化精英。他们的作品不但言语道断，风行云涌，更随时闪烁时代精神的火花。发前人所未发，感前人所未感；即使是千古不变的诗学主题如道德、情爱等等，也能关照现代，其品位、格调，与时代同步，或者其思想内容为时代所必须。我相信，这样的作品才是我们迫切需要，也是最具生命力的。

我们具有吟风啸月的诗学传统，也许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，都曾感动于《诗经》的桑洲沃野，感动于屈子的浩叹、太白的梦幻，感动于杜陵浣花溪，感动于浔阳江头客，感动于东坡月夜樽酒、山谷夜雨寒灯……但是，今天的人们生活环境、习俗，思想道德、心性情感，均已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我们的作者，如何在秦月汉关之外，体味现代生活，关注现代人的生命，把属于我们时代的情感、心性，注入诗词之中，吟咏出自己心声？这既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要求，也是诗歌文化传承、发展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

诗词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，虽然当今时代早已把它边缘化。文明古国数千年的歌咏传统，决不可能在一时间的文艺反叛或人为抑制下消亡，作为一种与精英文化所匹配的文艺形式，中华诗词早已深入我们民族的情感、心性。精英文化时代的消褪，不等于与此相应的观念的消失，当今时代，诗词生存、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，近年火爆的手机短信传递诗词之风和网络诗词发展，正是诗词“随风潜入夜”，“当春乃发生”的典型实例，是这种古老艺术顽强生命力的必然表现。

愿中华诗词之树常青。愿今日诗坛之精英辈出，愿中青年朋友担当起弘扬、光大中华诗艺的时代使命。

2006年岁次丙戌阳春三月

归路：中国诗歌的前途(代序)

一

白话新诗诞生于 20 世纪之初。胡适是白话新诗的第一个发起人和尝试者。他在《尝试集·自序》中说：“我做白话文学，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。”^①则他作白话新诗的尝试，当在此年或稍晚，发表白话新诗又要稍晚一些。他的《尝试集》是我国出版最早的新诗集。刘复也是白话新诗的最早鼓吹者之一，其态度之坚决、语言之激烈，不在胡适之下。为了催生白话新诗，并确立白话新诗的地位，新文化运动的悍将们，对传统诗词进行了猛烈的挞伐。胡适在《尝试集·自序》中指出：传统诗词之弊在于言之无物，“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，在于以文胜质”，“今人之诗，徒有铿锵之音、貌似之词耳，其中实无物可言。”这些作品，“读起来，字字是诗；仔细分析起来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他把传统诗词的作者斥之为“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”。“其

老者如郑苏盦、陈伯严辈，其人头脑已死，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；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，淫滥委琐，亦去文学千里而遥。”他们的作品是“半死的文学”^②。刘复在《新青年》三卷五号上发表了一篇诗论，对传统诗人及其作品作了猛烈的抨击。他认为“现在已成假诗世界”。他对易顺鼎、樊增祥、康有为等当时诗坛的代表人物极尽挖苦嘲笑，把易顺鼎、樊增祥斥为“斯文奴隶”，说他们被奉为“一代诗宗”，其实“半钱不值”。认为康有为广为流播的长诗《开岁忽六十》押韵牵强自不待言，“单就全诗命意而论，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，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。”至于古代诗人诗作，刘复只肯定“国风”是“最真的诗”，《诗》以下，“只有陶渊明、白香山二人可算真正诗家”，其余均缺少一个“真”字^③。在批判传统诗词的同时，他们对白话新诗又进行积极的倡导。胡适在《尝试集·自序》中谓诗歌革命要“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”。他提出“言之有物”、“讲求文法”、“当用‘文之文字’时，不可故意避之”三点主张。第一点就诗歌内容而言，二、三就诗歌形式而言。所谓“讲求文法”、“当用‘文之文字’时，不可故意避之”，就是要用白话文的文法取代传统诗词特殊的句法，用白话长短不一的“天然的音节”取代传统诗词有规律的节奏。他提倡“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，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”，认为这样才算“真正的白话诗”，才“叫做诗体大解放”。“要造一种活的文学，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”，白话“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”^④。后来，他又发表了《谈新诗》^⑤，重申诗体解放，并从周作人、康白情、俞平伯等人的具体实践，总结白话新诗的成绩和

进步，说明白话新诗优于传统诗词。刘复力主张废除旧格律的束缚。他在《新青年》三卷五号的那篇诗论中说：“作诗的本意，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，便算极好。”郑振铎也提出“诗体大解放”的主张：

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，我们要一概打破。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；一受束缚，便要消沉或变性，至少也要减少他的原来的强度。

我们要求“真率”，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。不隐匿，也不虚冒。我们要求“质朴”，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，雕琢与粉饰不过是“虚伪”的遁逃所，与“真率”的残害者。^⑥

白话新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，从白话新诗诞生之日起，对它的形式又作了许多尝试和探索。最早的白话新诗，无论情调、意境、句式、用韵，都还带着传统诗词的痕迹。胡适《尝试集》中的作品，脱胎于词的小令。沈尹默最初的作品，脱胎于古乐府。傅斯年、俞平伯、康白情的作品，脱胎于词曲。以后，新诗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，不拘形式，不讲押韵，注重表现实感和诗情，著名的有冰心的《繁星》、梁宗岱的《晚祷》、宗白华的《流云》、郭沫若的《女神》、朱自清的《踪迹》、汪静之的《蕙的风》、王独清的《圣母像前》。后来，徐志摩、闻一多等人将西洋诗的格律移植到白话新诗来，新诗坛又兴起了摹仿西洋诗的新格律诗热潮，徐志摩的《猛虎集》、《志摩的诗》，闻一多的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。

由于胡适等人积极提倡，由于白话新诗人努力探索和实

践，白话新诗迅速成为诗坛的主角，短短二十年间，涌现了一大批作者，发表了一大批作品。1922年出版的《雪朝》，辑入朱自清、周作人、俞平伯、徐玉诺、郭绍虞、叶绍钧、刘延陵、郑振铎八人的作品，可能是最早的白话新诗选集。许德邻的《白话诗选》，初版时间不详，1926年4月已出了四版。书中选入了胡适、刘复、康白情、沈尹默、李大钊、玄庐、郭沫若、王统照、俞平伯、傅斯年、田汉、周作人、陈独秀、叶绍钧、刘大白等七十多的作品。薛时进的《现代中国诗歌选》出版于1933年，入选的作者有胡适、刘复、玄庐、李大钊、予同、沈尹默、周作人、俞平伯、康白情、刘大白、冰心、宗白华、梁宗岱、刘延陵、徐玉诺、朱自清、汪静之、章衣萍、赵景深、郭沫若、穆木天、王独清、冯乃超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饶孟侃、朱湘、刘梦苇、于赓虞、戴望舒、李金发、杨骚、石民、邵洵美、林徽音、方令孺、孙大雨、陈梦家、方玮德、梁镇、曹葆华、沈祖年42人。从上面两种选本人选者的数目和名字，可以略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新诗的声势和阵容。《白话诗选》选入早期的白话新诗，多是“有什么说什么，要怎么说就怎么说”的作品。《现代中国诗歌选》大部分是有韵的新格律诗，可见20世纪30年代新格律诗是白话新诗的主流。

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，是白话新诗的黄金时期，当时的新文学家，几乎都以新诗走上文坛，许多人都由写白话新诗成名。白话新诗之所以能风行一时，原因不在其优于传统诗词，而在其“新”。白话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，繁荣发展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。这是一个狂飙时代，打破传统、追求新变成为时尚。新的思想、新的文化大量涌现，白话新诗

以其“新”而为人们所仿效。白话新诗之所以能风行一时，原因又在其“放”。白话新诗的倡导者们以摆脱传统束缚、打破“枷锁镣铐”相号召，正好与五四精神相一致，“有什么说什么，要怎么说就怎么说”的白话新诗，适合表现人们激进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，适应时代的需要。白话新诗之所以能风行一时，原因还在其“洋”。人们以追求外国的东西为时髦，取法西洋诗的新格律诗自然备受青睐。

但是，白话新诗的致命弱点是不符合民族的诗歌审美要求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，传统小说、散文、戏剧（我指的是戏剧文学）为现代小说、散文、戏剧所取代，唯独白话新诗取代不了传统诗词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讲平仄、讲节奏、讲音韵的传统诗词（我指的是近体诗和词），具有无与伦比的语言音乐美；其特殊句法，又将汉语言的魅力发挥到极致。传统诗词的形式不仅长期为古人所运用，也为现代人所喜闻乐见，时代改变了，民族的诗歌审美标准并没有改变。打破“枷锁镣铐”、“要怎么说就怎么说”的白话新诗风行于一时，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诗歌审美取向。再说，不讲用韵、不讲节奏、随意书写的白话新“诗”，也很难说是诗。诗亦称“诗歌”，是可歌可吟的，西洋诗也讲节奏用韵。即使是摹仿西洋诗的新格律诗，也总比完全散文化的“诗”要好得多。白话新诗产生至今，作品数以万计，能为人们记诵的也仅有徐志摩、闻一多等几个新格律诗人的个别篇章。白话新诗以其“新”、“放”、“洋”而适应时代，因时代而诞生并得以繁荣发展。然而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渐退，人们对白话新诗的热情也就渐减。白话新诗因其违背民族的诗歌

审美取向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抛弃。先前在白话新诗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诗人，没有几个能坚持到底：胡适做考证去了，郑振铎钻进故纸堆中，沈尹默成为学者、书法家，周作人改写小说、散文，俞平伯一头扎进《红楼梦》研究当中，康白情、梁宗岱、郭沫若……也纷纷弃新诗不作。20世纪40年代，白话新诗已明显地走下坡路。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，艾青、何其芳、臧克家等人的作品，或以爱国主义热情、或以现实主义精神赢得了读者，但就总体而言，40年代白话新诗已不能跟二三十年代相比。形式仍在探索，有摹仿马雅可夫斯基的“阶梯体”，有仿效陕北民歌的“信天游体”，但因脱离传统而未能取得突破。50年代前期，产生过一批真诚讴歌新中国、真实反映新生活的作品。“反右”以后，由于政治对文艺的积极干预，新诗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工具，“文革”期间，更成了政治的标语口号，完全失去了它的倡导者们所标榜的“真”，新诗坛充斥着文质并劣的作品。改革开放前期，新诗坛掀起了朦胧诗的热潮，这些作者不知所写、读者不懂所云的“天诗”，把白话新诗推向了绝境。近十年，新诗几乎绝迹于中国内地报纸的文艺副刊，新诗人纷纷改写散文，改写小说，改写报告文学，改写传统诗词。新诗坛沉寂得令人忧虑。

二

白话新诗兴起之前，传统诗词独占诗坛；白话新诗兴起以后，传统诗词迅速丧失了阵地。郑苏盦、陈伯严、易顺鼎、樊增

祥、康有为照样写他们的旧体，南社诗人也未停止他们的吟咏；但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，传统诗词风光不再。备受尊崇的传统诗人遭受冷落和嘲讽。南社诗人“世以为怪”，被斥为“淫滥委琐”。南社诗人王均卿自号“新旧废物”，这固然是诗人无奈的自嘲，也反映世人对传统诗人的轻蔑。传统诗人被视为“遗老”，昔日再报刊上大行其道的传统诗词，逐渐退缩到文人学者的书斋。南社的消亡最能说明传统诗词的衰落。南社 1909 年创立于苏州，社名取“操南音不忘其旧”之意。南社既是一个革命团体，也是全国性的传统诗人组织，其宗旨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推翻清朝专制统治。早期的南社诗人多为同盟会员。除发起人陈去病、高旭、柳亚子外，南社的著名人物还有苏曼殊、于右任、叶楚伧、黄节、林庚白、宁调元、沈钧儒、刘季平、潘飞声、吴梅、俞剑华、秦锡圭、马君武、邓尔雅等。南社鼎盛时分社遍布全国各地，社员达一千一百余人。社员所作诗文，编为《南社丛刻》，分送各地诗友。这样的一个有政治背景、有全国影响的传统诗人组织，在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下，不出数年便引起了内部分化。一些原先反对白话新诗的南社诗人，思想产生了动摇，态度逐渐转变。最典型的是南社领袖柳亚子。1917 年，他在《与杨杏佛论文学书》中表示了反对白话新诗的鲜明立场：

弟谓文学革命，所革当在思想，不在形式。形式宜旧，理想宜新，两言尽之矣。又诗文本同源异流，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，殆不可少；第亦宜简洁，毋伤支离。若白话诗，则断断不能通。^⑦

1924 年，他在《给吕天民的信》中，态度明显地转变：

我以为我们自己欢喜做旧诗，尽做也不妨（我自己就是只会做旧诗而不会做新诗的一个人）。至于因为自己欢喜做旧诗，或者是擅长于旧诗，而就反对新诗，那未免是太专制了。^⑧

他甚至认为由有韵诗变为无韵诗，符合诗歌发展规律。柳亚子尚且如此，其他南社诗人可想而知。南社终于抵挡不住新文化运动的浪潮，到1923年便停止了活动。南社解散，标志着传统诗词全面衰落。

但是，传统诗词并没有消亡。南社停止活动以后，绝大多数南社诗人还继续旧体的创作。南社不存在了，各地仍有大大小小的诗社。虽然传统诗人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和排斥，传统诗词也未进入现代文学史家视野，但是传统诗词魅力依然，其形式还为许多人用于吟咏山川、抒怀遣兴。毛泽东得句于马背，陈毅成诗于战场，至于文人学者，坚持旧体创作并取得成绩者多不胜数，如陈述叔、鲁迅、刘永济、陈寅恪、张恨水、郁达夫、林散之、夏承焘、詹安泰、聂绀弩、钱仲联、饶宗颐、沈祖棻、邓拓、吴祖光、霍松林……都是有全国影响的旧体高手。有传统文化基础的人，多以诗词自娱；甚而贩夫走卒，能诗能词者间亦有之。我们说传统诗词衰落，是因为：一、丧失了诗坛独尊的地位，沦落为诗坛配角；二、在公开出版物中不再大行其道；三、被文学史家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；四、由于以上原因，写传统诗词的人相对地少了。传统诗词的衰落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是传统诗词复兴的酝酿期。其时白话新诗已沦落为政治的标语口号，完全失去了文学作品的艺术

魅力,因而遭到人们轻蔑和抛弃。于是,诗歌爱好者又重觅传统的形式。在动辄得咎的年代,人们偷偷地学,偷偷地写。许多勤奋好学之士,不愿浪费时光,一头扎进传统诗词的学习与创作当中。各地有名望的老诗人,身边都有一群学诗的青年。传统诗词在黑暗的年代得以延续和发展。经过十年的酝酿和积聚,在改革开放前夕,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地下旧体诗坛。1976年4月初,涌动于地下的传统诗词熔岩,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作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喷发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,使传统诗词从地下破土而出,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漫山遍野地生长,以铺天盖地之势昭示其旺盛的生命力。20世纪80年代至今,是传统诗词复兴并空前繁荣时期:作者之众、作品之多、成绩之著,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仅见。现在县县有诗社,社社有诗刊,传统诗词出版物汗牛充栋,《中华诗词》、《当代诗词》、《诗词》报风行海内外。传统诗词在报刊大行其道,风头远盖新诗。形形色色的雅集活动、大大小小的诗词研讨会多不胜数。国内的传统诗词事业又与海外的传统诗词事业紧密联系、互相促进,中华传统诗词的春风吹遍五大洲。

三

近百年来,白话新诗与传统诗词逆向运动;前者由繁荣而衰落,后者由衰落而繁荣。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,中国诗歌几经折腾又回归传统。白话新诗和传统诗词都经历过衰落,但

二者衰落原因不同：白话新诗在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并得以繁荣发展，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生态环境。白话新诗的衰落完全是由于它脱离了诗歌的民族传统，违背了民族的诗歌审美取向，不为民族所喜闻乐见。它虽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力鼓吹，经诗人长期探索和实践，但因离开民族的土壤而未能取得应有的成就。白话新诗衰落完全是自身缺陷所致。传统诗词则因备受打压、缺乏客观生存条件而衰落，它的衰落不是自身缺陷引起的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传统诗词之树一旦拂以春风、加以水土，就枝繁叶茂，生机勃勃，原因就在那里。大半个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史说明：传统诗词是中国自己的诗歌，回归传统才能重现“诗国”的辉煌。

回归传统，是回归传统的形式，而不是回归传统的内容。南社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宗旨，南社领袖柳亚子提出“形式宜旧，理想宜新”的口号，南社诗人正确地处理旧与新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诗人要用传统的形式，表现时代的内容，抒写时代的感情。唯其如此，传统诗词才能与时俱进，才能与时代合流，与世界接轨。

回归传统，又要革新传统。传统的格律早已为民族所定型，民族的诗歌审美要求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，自唐迄今，传统的格律一直为民族所喜闻乐见，它最充分、最恰当地体现汉语言的音乐美。传统的格律除用韵可以放宽之外，其他都不宜改变。传统的表现手法既要继承，也要革新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，传统诗词是在变革中发展的，唐诗新变而后有宋诗，宋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与唐诗并峙的巍

峨雄伟的宋诗大厦。即使是同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作品，也有不同的面貌。中唐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、韩愈、孟郊，继盛唐李白、杜甫之后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创作出新一代的诗歌。传统的语言也要革新。语言因社会生活的改变而不断出新。诚然，古汉语的某些词语、古汉语的语法(如词性活用等)可以运用，但应该多用现代汉语的单音词入诗。古代的名物偶然可以借用，但不宜多用；多用则远离时代，满纸腐气。典故也可以适当运用；但动辄用典，故作高深，便扼杀了诗歌的生命。

回归传统，就要让传统诗词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放射出新的光彩。当年白话新诗的倡导者们，以传统诗词“文胜于质”、缺少真情而打倒它们。当代的传统诗词要文质并美，要反映真生活，抒写真感情。酬答唱和宜少，写实抒情须多。

回归传统，就要高张传统旗帜。一要普及传统诗词的教育与训练，培养和造就年轻一代诗人。现在传统诗词创作队伍严重老化，五六十岁视为年轻诗人。如果不抓紧培养年轻作者，不出十年，传统诗词将后继乏人，必因自然淘汰而不可避免地衰落，繁荣局面难以持续。报载现今中国内地有 150 万中小学生读经，传统文化教育正在勃兴，这正为传统诗词培养接班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二要进一步扩大传统诗词的影响。首先要办好一批有基础的诗词刊物，提高它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。其次要出版一批高质量的专集、选集。现在传统诗词铺天盖地，精品却甚少，严重影响传统诗词的声誉。我们主张写少一些，写好一些；诗词专集、选集出少一点，出精一点。三要